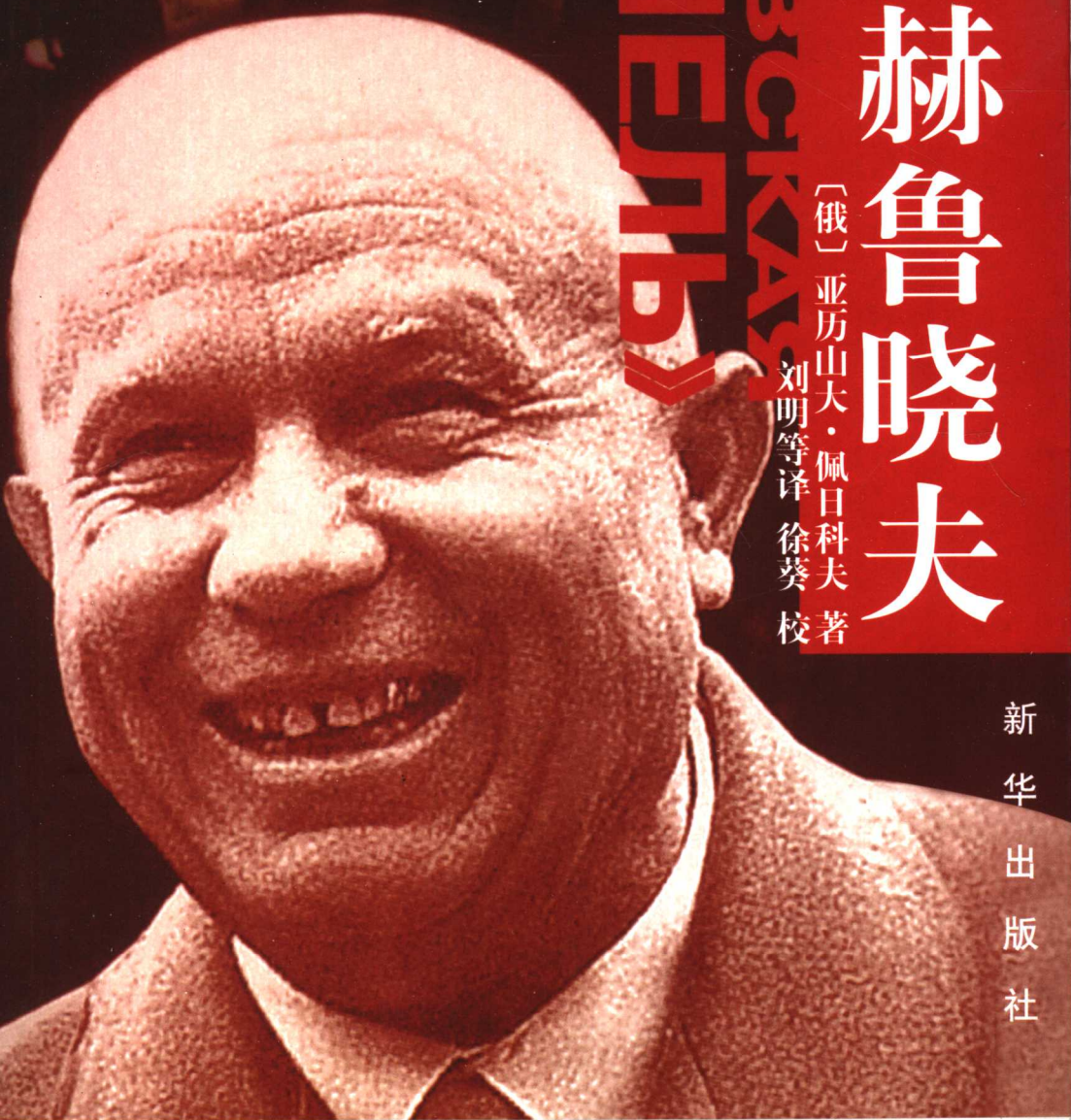


解冻的赫鲁晓夫

〔俄〕亚历山大·佩日科夫 著
刘明等译 徐葵校

ХРУЩЕВСКИЙ
«ОТТЕПЕНИЕ»

新华出版社



解冻的赫鲁晓夫

VOYENNA



“解冻”的赫鲁晓夫

〔俄〕亚历山大·佩日科夫 著

刘 明等 译

徐 葵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冻”的赫鲁晓夫/(俄罗斯)佩日科夫著;刘明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12

ISBN 7-5011-7296-X

I. 解… II. 刘… III. 政治-研究-俄罗斯-1950~1969

IV.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7445 号

图字: 01-2004-3548 号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2006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解冻”的赫鲁晓夫

译者: 刘明等

译校: 徐葵

责任编辑: 阎秋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地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27.5 插页 8 张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1-7296-X

定 价: 39.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89580863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佩日科夫，
历史学博士，曾任俄罗斯
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副
所长，自 2001 年起，出任
俄罗斯政府总理助理。

特别推荐

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 定价：33.00 元

俄罗斯式的私有化 定价：23.80 元

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 定价：20.00 元

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 定价：20.00 元



校者的话

本书是在档案材料基础上叙述和评论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从1953年到1964年在苏联执政十年这段历史的一本专著。

作者亚历山大·阿拉基米罗维奇·佩日科夫生于1965年，是历史学博士。他是一名专门研究20世纪俄国和苏联历史的历史学家，曾发表过一系列著作，如《赫鲁晓夫解冻的冲突》（合著，1997年出版）、《1953—1964年苏联社会的现代化经验：社会政治方面》（1998年出版）、《20世纪50—60年代苏联的政治改革》（1999年出版）等。他于1989年毕业于以克鲁普斯卡娅的名字命名的莫斯科师范学院历史系，后曾在苏共中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院、青年研究院科学研究中心、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担任不同的职务，在十年时间中走过了从实习研究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院）到研究所副所长（俄罗斯科学院当代政治历史研究所）的道路。他曾作为专家参加了俄罗斯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的工作，并于2000年担任俄罗斯联邦电信和信息部的部长助理，从2003年11月起担任俄罗斯联邦政府主席的助理。

作者在本书前言中介绍了苏联和俄罗斯历史学界几十年来在研究赫鲁晓夫执政这十年的历史中曾经历过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当时人们对赫鲁晓夫的话

动，完全采取肯定的态度；1953—1964年这个时期在一些历史著作中被称为“伟大的十年”；赫鲁晓夫所倡议的各种改革往往都被认为是其正确性已被生活所证实的杰出的创作。

第二个阶段是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20多年中，由于苏联当局对赫鲁晓夫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政策，1953—1964年这个历史时期实际上已不被苏联历史学家所关注。这时在苏联有一种比较固定的看法，认为苏共中央1964年迫使赫鲁晓夫辞职下台的十月全会已对这一时期做出了一切必要的评价，学者们不必再把注意力放在研究过去各个时期所犯的 errors 和缺点上去。其结果是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复杂问题，首先是对这整个阶段的评价，实质上始终没有进行积极的研究。对于与赫鲁晓夫的这一活动时期有关的许多问题，如政治体制的功能、党内斗争、决策机制等等，都缺乏分析和研究。

第三个阶段是在80年代中苏联改革开始以后。这时苏联学者开始摆脱僵硬的思想束缚，重新认识苏联所走过的历史道路，20多年来许多人对赫鲁晓夫的活动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而今却又变成了难以抑制的赞扬。很多人在这个阶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去回顾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和评价过去20年中已很少谈论的那十年的各种情况 and 问题的。但是，作者认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苏联有些历史研究成果带有走极端的特点，尤其流行的是把苏联官方历史学中的一切都全盘否定，而把与官方历史学没有联系的一些人的看法又过分理想化和美化。

作者指出，俄罗斯历史学界只是在最近时期才开始以更加慎重和权衡的态度来审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联历史；这时俄罗斯历史学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就是要求以更广泛的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进行研究工作，并且要求对历史事件做出更加客观的和不带偏见的结论。作者说，他在本书中力求客观地评价50年代至60年代苏联的社

会和政治生活状况。他在本书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批判问题、全民国家问题、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问题、苏联的民族问题、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护法机关和护法政策的改革、苏联社会的社会心理状态和60年代初赫鲁晓夫划分工业党和农业党的政治改革等问题，都根据档案材料做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分析和评论。他在书末的附录中还附了许多档案材料，其中包括苏联在50和60年之交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几年中花了很大力量制订的苏联新宪法草案全文。如果赫鲁晓夫当时不下台的话，这部宪法草案无疑将被通过，用以代替斯大林执政时于1936年年底通过的苏联宪法，但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这部宪法草案就被弃而不用，而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于1977年通过了苏联的新宪法。

至于作者在本书中是否达到了他所说的力求客观地对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苏联十年的历史作出评价的目的，这需要由读者来加以判断。不过，他所遵循的意图，即以档案材料为依据，力图对历史作出尽可能客观的和不带偏见的评价，尽可能使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无疑是值得赞许的。他在书中引用的大量历史材料和提出的许多观点，他在本书附录中所附的许多档案材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赫鲁晓夫其人和他在苏联执政的这十年历史是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的。

徐 葵

2005年4月

前 言

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上半期这一时期，是祖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它对国家和社会今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约·维·斯大林的逝世和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当时开始的体制自由化的进程，并没有获得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上层人士的应有的支持。与西方的公开的、处于战争边缘的对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是国际缓和并不明显，常常受到外交方面甚至军事方面的紧张局势残余的毒化。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与盟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经济继续不平衡地以粗放的方式在发展，对经济实行改革的尝试，具有严重的行政性质，很少有助于效率的提高。社会领域中的积极变化，仅仅局限于国家的城市居民，而在实质上很少触及到占国家一半的农村居民。大规模的镇压运动停止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对社会舆论本身仍然不予重视，践踏人权的许多做法仍未终止。权力仍然掌握在党的机关和强力组织的手中。还出现了诸如“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等新的消极现象。

在学术著作、政论文章和文艺作品中，作者们对祖国历史这一阶段中苏联社会的这一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做了不同的、往往是相互

矛盾的描述。在祖国的历史编纂学中，对所研究的这一阶段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在对大量事实进行阐述时，与一些新的评价和立场同时并存的，还常常有旧的框框和教条主义的立场以及随风倒的现象。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既受到了赞赏，也受到了批评。直到苏共中央十月全会（1964年）为止，与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位上的活动有关的这一时期完全是用肯定的语气加以叙述的；不但如此，1953—1964年的这个时期在一些历史著作中还被称为是“伟大的十年”。赫鲁晓夫所倡议的改革的各个方面，都被认为其正确性已被生活所证实的杰出的创作。

在赫鲁晓夫离开政治舞台之后，在历史和党的研究工作中，曾试图摆脱这种应景性质的积淀。但是就在那时候，一些后来在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期对历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特别不良影响的因素，已经开始在起作用。国内的研究人员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进行了许多热情高涨的工作后，在这时候，1953—1964年这段时期实际上已经不被他们关注了，这种状况是由于对赫鲁晓夫个人采取避而不谈的政策而造成的，这一政策一直被执行到80年代中期。其结果是一系列复杂问题，首先是对这整个阶段的评价，实质上始终处于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外。这涉及到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研究，如政治体制的功能、党内斗争、决策机制等。对于与赫鲁晓夫的活动时期有关的许多问题缺乏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60年代中期开始固定下来的那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苏共中央十月（1964年）全会对这一时期已经做出了一切必要的评价。要求学者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过去各个时期所犯的错误和缺点上。

60年代末和80年代上半期的苏联历史学实际上已不对这一时期进行积极的研究了，而与此不同的是，在西方，人们却对苏联生活中这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进行了积极的研究。他们创作了大量著作，在其中详细分析了苏联制度运作的各个方面。当时外国研究人员的著

作被说成是虚构的历史。对他们的观点和理论要加以“揭露”。对待西方苏联问题专家的著作的态度，要视这些著作的结论是否接近于苏联历史文献中确定的对一些现象和事件的评价而有不同。但是，我们觉得，外国研究人员对赫鲁晓夫时期的研究做出的贡献是极其宝贵的。外国苏联问题专家所做的许多工作在 80 年代末对苏联国内学者是一种重要的帮助，这时苏联学者已开始摆脱僵硬的思想束缚，来重新认识所走过的历史道路。

对赫鲁晓夫的活动以前实际上是避而不谈，现在则变成了难以抑制的赞扬，人们在这种背景下试图去回顾他的执政年代，去评价好像已很少谈论的那些年代。只是在最近时期，人们开始以更加慎重和权衡的态度来审视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苏联历史，尽管目前在学术著作中，尤其是在大众传媒中，也还可以遇到对我们不久以前的历史进行各种各样政治投机的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进行那种考虑到人们对待历史事实、事件和现象的各种态度，同时以更广泛的历史资料为基础的研究工作，而更重要的是要做出更加客观的、不带任何偏见的、非政治化的结论。

现阶段历史科学发展的特点，是摆脱了许多老的条条框框。对于那些注重方法论问题、重视历史科学对现实的意义并强调历史学家有责任对历史做出“不依附于党”的可靠的说明的学者们，应该给予他们以应有的评价。

历史学家也应该从目前所掌握的知识高度，并考虑到那些年代的具体历史条件、情况和可能性来对过去进行评论。但是，80 年代和 90 年代之交的有些研究成果有着好走极端的特点。尤其流行的是把苏联官方历史科学中的一切都全盘否定，而把与官方历史科学没有联系的那些人的看法过分理想化和美化。也不能不注意到另一个情况，即本国的政论作品已开始习惯于认为西方苏联问题专家笔下的东西与国内历史学家的评论比较而言更为可信。

在现代历史科学中人们更加关注分析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它的各种决议和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意义。某些作者揭示了代表大会的思想对斯大林逝世后最初几年和其后时期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他们的著作中包含了有关代表大会是如何准备的、是谁倡议提出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和原斯大林周围的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等方面的翔实而丰富的材料。

学者们对赫鲁晓夫在那十年期间的各个方面的活动进行了研究。在这十年中，赫鲁晓夫确定了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除此之外，赫鲁晓夫的独特性格特点也是研究人员感兴趣的一个方面，他的性格对他的活动是有影响的。学者们（而且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不仅对他在相当复杂的夺权斗争条件下得以上升，而且也对他似乎在社会发展中已出现了重大改变之后跌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与此同时，他们力求对当时在经济、国家管理、党内生活和社会政治制度方面进行的改革作出分析和评价，力求认识这些改革行动所产生的正面的和负面的结果。为什么“伟大的十年”没有成为苏联人民生活中伟大的时代——这个问题也同样是历史学家们研究的问题。今天很多人对这个时期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多了解。但是，与此同时还留下了许多具有总的政治意义，并要求从中吸取历史教训的问题。

一些研究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在苏联已经形成的政治制度的著作指出，苏联政治制度在保留其基础不变的情况下，仍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斯大林逝世和其后不久正式开始了对个人崇拜的批评，并确认不能容忍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之后，实际上出现了对社会政治制度实行现代化、改组和改革，以及扩大真正的民主的可能性。

应该把研究赫鲁晓夫在文学艺术领域内的“解冻”，以及赫鲁晓夫个人对待艺术知识分子的立场和社会上对这种立场的接受情况的学术著作和社会政治著作，归为一个独立的类别。要知道，苏联社会生

活中最具体的不良现象，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是在一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中被揭露出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许多文学作品承担了重要的社会历史重担。

回忆著作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是主观的。但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的回忆录，可以使人们深入到历史事件的“幕后”和“内部”，了解到许多新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在回忆录作者的行列中，有苏联国家的政治、党务、国务和经济活动家，还有知识创作界的代表。对于理解历史事件特别有价值的，是那些历史事件直接参加者的观点和日记体裁的报告，它们反映了对历史事实、事件和现象的即时的评价。在我们已提到的那些题材方面，许多回忆录已在期刊里用文章和答记者问的形式得到发表。

我们过去政治历史中的一些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如人民与政权、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下层”对“上层”的某些步骤的反应，早已经成为历史学家，包括俄罗斯历史学家集中关注的对象。但是，对于俄罗斯学者来说，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认真地研究和讨论人民与其上层人物之间，以及群众与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只是在不久以前才成为可能的事情。尽管如此，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在苏联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中有关人的因素的学术著作。帝国心理的毁灭、复活和再次破灭，对斯大林产生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前提，苏联公民的大众意识和行为的两重性，集体的愚蠢和个人对政体的不满以及内心对它的抵抗，这些问题都已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

对历史著作进行的分析，可使我们提出一系列原则性的看法。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吸引了历史学家们最大的注意力。但是，研究兴趣通常集中在这个政策的个别关键事情上：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七月（1953 年）和六月（1957 年）全会，1953 年 3 月初发生的各种事件。还没有形成可完全揭示和追踪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曲折过程的完整图画。显然，对这个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将

提供一个更准确的有关克服个人崇拜后果的性质的概念。

把苏联共产党倡议的改革，以及它们对社会机体的状态产生的影响等重大问题纳入科学分析的范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现代历史学家们也没有忽视对 1953—1964 年期间党内斗争问题的关注。根据重要的历史资料，对赫鲁晓夫为取得个人一长制的领导地位而以自己的政敌进行的斗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是，对这个问题经常是就事论事地去研究的，脱离了对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权力结构的组织问题上提出的不同看法的冲突的研究。在这方面，从一定的权力结构的立场上去审视众所周知的那些党内斗争的事件和事实的观点是较为有效的。它可使我们去重新认识人们已知道的那些年和社会生活的倾向。

历史学家们才刚着手去认真研究苏联社会广泛阶层是如何接受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方针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的。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进展。这项工作是与吸纳新的档案材料，把它们汇集到一起以建立一幅完整的图画和分析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社会情绪的做法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对斯大林逝世后社会中护法制度的改革和使它具有更文明的“形式”这个题材进行的各方面分析，具有巨大的科学实践意义。在出现了大量研究斯大林的罪行和大规模镇压运动牺牲者的平反过程等题材的著作的背景下，这一点就显得尤其必要。目前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还很不够。

以原始文献为基础对大量的史科学材料提出的看法具有重大的意义。正是原始文献的充分和翔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质量水平。根据史科学标准，可以把上面概括地讲到的全部历史著作分为两个阶段。按年代顺序来说，第一个阶段是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出现的著作。当时撰写的大量著作基本上是根据具有回忆录性质（包括持不同政见者的）的原始材料（这类回忆材料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大量出

现的)和西方历史学派学者们的意见(国内的大众媒体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刊登他们的意见)而写出来的。那些年的学术著作的一个特点是利用档案材料的数量很有限,这是由于档案机关的封闭性,只有极有限的人才能进入这些档案机关的缘故。

在1991年之后,国内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为研究苏联整个政治历史,尤其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政治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大量的档案材料已经可以使用,并被积极地引进到学术交流中去,这在客观上提高了历史研究工作的水平。一些专门研究那个时期的问题的俄罗斯著名学者,如P.皮霍亚、A.丹尼洛夫、Ю.阿克修金和E.祖布科娃,他们的著作的特点就是引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

政治历史方面的一些新的研究著作的出现,都是与进一步扩大和考察原始史料基础有密切联系的,这本身就确定了使用原始史料的现实意义。本著作之所以能够出现,也同其他所有进行具体研究的著作一样,是得益于可接触到与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大量原始史料。首先应该说一说那些已公开的并在专家范围内广为人知的材料,可以把这些材料看做是研究50至60年代政治历史的支柱性材料。这就是已经出版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次和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苏联最高苏维埃例行会议的速记记录,以及党、政府和社会组织(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的各种决议,这些材料已经被汇编成册:《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和决定汇编》(8-10卷)、《党务工作人员手册》(已出版1-6册)。

在90年代公布了大量涉及到50年代到60年代社会政治历史的新的档案文件。其中应特别指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月(1953年)和6月(1957年)全体会议的速记记录,这几次全会对苏联政治制度的发展有着命运悠关的意义。

在1989—1991年期间出版的《苏共中央通报》这个刊物上发表

的材料，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这些出版物刊登了那个时代的很有意思的档案证明材料：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是历史科学中人们期盼已久的巨大事件），苏共中央各种会议（包括60年代存在的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的会议）的速记记录，关于“列宁格勒案件”的材料，社会活动家们写给党中央的信等等。《史料》杂志全面地接过了“苏共中央通报”的接力棒，例如它发表了1953年3月5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联席会议的记录。这份文件使历史学家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弄清楚在斯大林逝世之际权力的划分过程，以及在争夺斯大林的政治遗产的斗争中最初的力量配置情况。

尽管这些出版物非常重要，但是，它们自然无法代替对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全部档案材料的研究，其中绝大部分档案在90年代初开始开放。在这些文件中，具有首要意义的是1953—1964年期间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速记记录。这些文件被保存在俄罗斯联邦现代史国家档案馆里（第2号全宗，第1号目录）。在这期间共举行了29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这些资料对于确定那些年政治生活的基本轮廓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并使我们能够明了苏联最高权力层中的主要力量和派别的立场。尤其是在1953—1957年阶段，在这一时期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展开了最残酷的党内斗争，在这一期间的斗争中，赫鲁晓夫获得了领先的地位。在我们看来，这些文件作为史料还仍然没有被充分研究，而主要的是还没有被研究人员所充分掌握，而它们是对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反对贝利亚（1953年7月）、反对反党集团（1957年6月）和反对国防部长格·康·朱可夫（1957年10月）的关键性政治战斗画面的重要补充。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处会议的材料，也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今天尤其能强烈地感觉到这些文件的潜在价值。它们构成了总统档案材料（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3号全宗）和俄罗斯联邦现